

智识与政治之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初探(1945—1953)

陈雅蓉

内容提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中国国民政府和一众知识分子以李约瑟为重要枢纽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和创立。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会员国,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智识合作,组织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会议,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并筹划和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地区基本教育研究会议,展现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交织的心态和情绪。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法理、活动、修辞手段以及外交部署,深度主导了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合法性和国际代表。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利用国民党时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关系,谋求延续在该组织中的中国代表权,使得冷战时局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历史关系进一步政治化,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海峡两岸的文教合作留下了复杂的遗产,影响了冷战期间乃至更长历史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海峡

* 陈雅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学院博士后。(邮编:100086)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和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两岸的教科文合作。

关键词 国际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 中外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成立起来的国际政府间合作组织。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达维德·米特拉尼(David Mitrany)在1943年出版功能主义的经典论述,主张战后世界应从功能需求出发,推动国际组织发展。^① 功能主义秉承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认为人们可以借用理论工具去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对现象进行分类,分析现象的相互关系,形成问题描述并通过恰当的方法进行经验调查。^② 在社会管理和治理层面,功能主义把政治和技术分开,相信在政治之外有诸多人类现实的共同需求,因此他们相信治理中存在特定的技术和非争议的部分。^③ 在国际事务层面,功能主义希望聚焦于人们共同的需求,扩大非政治的治理领域,并且认为基于现实共同需求的合作,可能会促进世界共同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许多理念和项目便体现功能主义,例如,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和人与生物圈等都对战后的国际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④

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一度严重政治化。由于冷战时期东西阵营及中美关系等原因,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的代表权在1971年之前都由台湾当局所持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互动直接受限于海峡两岸的政治现实,更是与中美关系互相交织,使中国政府没能搭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平台,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也困难重重。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的关系时,对1945—1949

①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3.

② Mark Mazower, *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181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 Y.: Penguin Books, 2013, pp. 94-102, 144.

③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6.

④ Poul Duedahl, ed., *A History of UNESCO: Global Actions and Impacts*,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Aigul Kulnazarova & Christen Ydesen, *UNESCO without Borders: Educational Campaigns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London: Routledge, 2016; Akira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年及整个冷战时期进行了一些初步介绍研究。^① 本文综合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剑桥大学图书馆李约瑟档案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的档案，借助多个档案历史资料和报刊杂志的互证，通过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到冷战早期，国民党当局和诸多知识分子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详细的互动过程，梳理、总结和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历史关系的源流、演进，进而探讨其对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国际合作产生的影响。

一、中国参与筹备创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 世纪上半叶，战争和重建主导了历史叙事。但是，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所言，战争往往是国际合作乃至国际组织创建的催化剂。^② 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在 1997 年的《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Culture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一书中，认为文化国际主义就是通过跨疆域的文化活动培育国际合作。^③ 欧洲大学学院教授格伦达·斯卢佳（Glenda Sluga）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是国际主义高涨的时期。^④ 面对法西斯的扩张，盟国之间先后通过《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莫斯科会议（《莫斯科宣言》）、开罗会议（《开罗宣言》）、雅尔塔会议（《雅尔塔协定》）等一系列会议和宣言进行了军事协调部署。^⑤ 除此之外，盟国也在教育、科学和文化等领域展开国际合作。在教育方面，盟国教育部长会议（Conference of Allied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ME）就是一个以欧洲盟国为主，在英国领导下的战时国际教育援助机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非欧洲国

① 谢喆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演进：一项国际组织对成员国影响的经验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谢喆平、张小劲：《传授与学习：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验研究》，《外交评论》2011 年第 1 期，第 48—59 页；谢喆平：《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成员国影响的实证研究》，《太平洋学报》2010 年第 2 期，第 28—40 页。

② Mark Mazower, *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1815 to the Present*, p. 11.

③ Akira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1.

④ Glenda Sluga,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ennsylvania Studies in Human Right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p. 79.

⑤ Mark Mazower, *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1815 to the Present*, pp. 178-235.

家比如中国才以观察员身份加入。^① 在科学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法等国家为对抗法西斯阵营也有诸多科学合作,而弘扬科学国际主义的重要篇章当属李约瑟所推动的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 SBSCO)。^② 随着日军在东南亚步步紧逼,英国一改绥靖政策而逐渐调整对华政策和态度。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同意李约瑟以协会名义,前往迁到重庆的中央研究院进行访学,推动对中国教育科学、文化生活的援助。在1943—1945年期间,李约瑟通过学术、外交、政治等各种渠道,以盟国之间形成的跨国科学合作网络为根基,把中英科学合作馆打造成核心节点,极大促进了战时国际科学援助与交流,深度影响了战后国际科学合作组织的讨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国科学家群体尤其是英法科学家已经在讨论设立战后国际科学合作机构的必要性。^③ 虽然这个过程中不乏英国、美国、法国的互动博弈,但中国在其中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并做出一定的贡献。因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内容包括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1943年夏,李约瑟便应邀与蒋介石会面;同年12月,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会面,蒋介石邀请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短板提批评意见,并请李约瑟在中英科学合作馆任期结束之前,准备一份报告讨论科学和技术在中国发展中的位置。^④ 1943年12月,李约瑟与宋子文通信,信中李约瑟提出战后全球科学合作服务机构的想法。中英科学合作馆成了他构思的灵感来源。根据宋子文与李约瑟的通信,宋子文认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

① H. H. Krill De Capello, "The Cre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4, No.1, 1970, p. 5.

② Patrick Petitjean, "The 'Periphery Principle': UNESCO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of Scientist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Polish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September 2007, pp. 734-741; Thomas Mougey, "Needham at the Crossroads: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in Wartime China (1942-1946),"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50, No.1, March 2017, pp. 83-109; Thomas Mougey, "Building UNESCO Science from the 'Dark Zone': Joseph Needham, Empire, and the Wartime Re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from China, 1942-6," *History of Science*, Vol.59, No.4, 2021, pp. 1-31.

③ Patrick Petitjean, "The 'Periphery Principle': UNESCO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of Scientists After World War II," pp. 734-741; Patrick Petitjean, "The Joint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 and of UNESCO after World War II," *Minerva*, Vol.46, No.2, 2008, pp. 247-270.

④ "Joseph Needham to T. V. Soong," December 29, 1943,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1.

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只是一个比较暂时的机构并不适于国际科学合作服务的长期推进, 因此, 他建议这样一个国际科学合作机构最好可以隶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强正在筹划的新联合国。^① 在李约瑟的设想中, 该机构以服务国际科学合作为主旨并配有人员、通讯设备, 但却具备一定的外交性质。^② 由此可见, 在李约瑟的构思中, 智识合作便与政治紧密相连, 而他带动的国际科学合作讨论也不可避免涉及诸多政治人物。

当时李约瑟正在撰写第一篇有关于战后国际科学合作的备忘录, 他提出在战争结束后应该由盟国联合筹备一个国际科学合作机构, 与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和其他类似的国际组织一道隶属于联合国, 并且以中英科学合作馆为模式。^③ 他的这份备忘录在全球科学家网络里广泛流传, 其中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诸多创始人, 以及美国、印度、善后救济总署、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代表。^④ 该备忘录也送达给蒋介石、杭立武、翁文灏、朱家骅、陈立夫及宋子文等中国高官和诸多学者。^⑤ 杭立武于 1944 年 8 月 3 日回复, 将把备忘录呈给蒋介石; 翁文灏则于同月 7 号回复, 承诺呈给中央研究院; 而陈立夫也于 10 月回复同意李约瑟的提议, 但认为机构的名字和宪章则应该细作讨论。^⑥

1944 年夏季, 英国为主导的盟国教育部长会议已经开始讨论在战后设立一个对所有盟国开放的国际文化教育机构。但是, 美国代表团的参与使得会议讨论的方向直接和战后即将设立的联合国挂钩。^⑦ 为筹备新的联合国和相关机构, 1944 年夏秋, 盟国代表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办国际会议, 时任中国

① “Joseph Needham to T. V. Soong,” December 29, 1943,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1.

② Ibid.

③ Joseph Needham, “Memorandum on Postwa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July, 194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2.

④ “Joseph Needham to J. G. Crowther,” July 25, 194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3.

⑤ “Han Li-wu to Joseph Needham,” August 3, 1944; “Wong Wen-hao to Joseph Needham,” August 7, 1944; “Chen Lifu to Joseph Needham,” August 10, 194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4.

⑥ “Li Se-kuang to Joseph Needham,” October 26, 1944; “Wang Shih-chieh to Joseph Needham,” November 25, 194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4.

⑦ H. H. Krill De Capello, *The Cre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p. 9-10.

驻美大使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中国由于国力弱,顾维钧并没有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半场而只参加了下半场。^① 顾维钧在会议下半场提议成立一个促进文化合作的国际机构,英美几无反对。^②

1944年12月,李约瑟在收到各种反馈和意见后重新修订他的想法,完成第二份备忘录。^③ 但是,盟国部长会议讨论进度显然比李约瑟设想的要快得多。美国代表已经提交报告,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for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④ 1945年2月,李约瑟在美国提案的基础上,提出该组织如果要发挥作用必须引入科学。^⑤ 接着,他于1945年3月1日致信盟国教育部长会议的科学委员会主席亨利·代尔爵士(Sir Henry Dale),重申科学的重要性,并第一次书面提出在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CO)名称中加入科学(Science)。^⑥ 李约瑟意识到,美国提案可能会在1945年4月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上提交讨论,因此,他建议英国参会代表在会上敦促将科学纳入该机构工作领域,并正式提议机构的英文缩写由“UNECO”改为“UNESCO”。^⑦ 在重新修订他的想法后,李约瑟完成第三稿备忘录,在其中他更加清晰地讨论科学在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中应有的位置。^⑧ 他甚至建议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下设立一个与经济社会事务委员会平行的科学委员会,联合国旗下诸多机构都应引入科学的维度。^⑨ 他再一次计划将第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现代史研究所档案藏,编号19441007,J4413067。

② Robert C. Hilderbrand, *Dumbarton Oaks: The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Postwar Securit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pp. 235-240.

③ Joseph Needham, “Measures for the Organ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cience in the Post-war Period,” December, 194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6.

④ H. H. Krill De Capello, *The Cre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 11.

⑤ “Joseph Needham to J. G. Crowther,” July 25, 194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3.

⑥ “Joseph Needham to Sir Henry Dale,” March 1, 194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9.

⑦ Ibid.

⑧ Joseph Needham,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a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March, 194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10; Joseph Needham, “The Place of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in Post-war World Organisation,” April 28, 194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12-D14.

⑨ “UNESCO Structure,” October 19, 194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8.

三版备忘录发送给 200 多位在中国的联系人，其中包括蒋介石、孙科、翁文灏、陈立夫、宋子文、朱家骅和杭立武等政府要员，以及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其他学者朋友诸如李书华、傅斯年、罗忠恕、李四光和汪敬熙等。^①由此可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草创时期，除了科学家、学者之外，政府官员更是深度参与，其中智识和政治之互动可见一斑。

旧金山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中国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成为第一个签字的国家，并且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②由于李约瑟的备忘录在中国科学界引起很大关注，当时在北碚和重庆包括中央研究院诸多研究所在内的 14 个科学社团和协会联合发电报，给当时参加大会的宋子文、胡适和吴贻芳等中国代表。电报称，这 14 个机构合并为北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他们热切地希望中国代表团可以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并推进成立一个包含国际科学合作服务的联合国文教机构。^③在中国提出倡议同时，李约瑟也建议英国文化委员会科学部部长葛罗瑟（J. G. Crowther）向戴尔爵士提出要求，让英国皇家学会效仿中国，也给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英国代表团发出类似电报，呼吁在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中给予科学应有的位置。^④李约瑟带着他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经历，积极地展开国际游说。虽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过程中，美国和法国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李约瑟的游说也并不是徒劳。在英国政府的邀请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备大会定于伦敦举办，而这其中便有中国的支持。

应蒋介石于 1943 年提出的要求，李约瑟在 1945 年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在报告中，李约瑟以他个人名义，列举可以促进中国科学国内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十大举措。^⑤他认为，中国已经有了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要促进中国科学和技术长远的发展应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就需要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

① “List of Contacts for Sending Joseph Needham’s Memorandum o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15.

②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an Francisco, June 26, 1945,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TC/uncharter.pdf>, p. 31, 2024-07-09.

③ “Newspaper Clipping,” May 11, 194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16.

④ Ibid.

⑤ Joseph Needham, “Report to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and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on the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Winter, 194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C100.

李约瑟建议中国政府、学术研究机构及社会方方面面都应该重视科学,包括中国的科技外交关系,尤其是中国参与国际科学合作。^①他指出,长久以来,中国都尊重学者和知识分子,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大会上极力敦促成立国际智识合作组织,中国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那将会极大地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②李约瑟视这份报告为高度机密,并计划将报告递交到供职于中国最顶尖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领导和科学家手里。这份报告首先会呈给14位重要的联络人,其中包括官员朱家骅、翁文灏、宋子文、孙科,以及学者汪敬熙、傅斯年、李书华、吴有训、李四光、蒋梦麟等;然后,再递交给另外的14名联络人,包括胡适、任鸿隽、梅贻琦、杭立武、叶企孙、金宝善等。^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名单里面,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也赫然在列。根据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学者付邦红教授的研究,李约瑟这份报告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和政治界同样引起高度重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战后科学发展规划。^④这份报告尤其是其中关于中国科技外交的建议也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及中国科学家对待筹备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态度,以及与该机构的关系与合作。

二、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会员国

尽管李约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而且和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诸多接触,但在游说过程中,他却把智识和政治有意无意地做了嫁接,而这也客观上使当时的国民政府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更强的政治针对性。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派出队伍庞大的国家代表团,其中包括首席代表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物理学家李书华、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工程师叶渚沛、教育家瞿世英、教育官员程天放、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心理学家汪敬熙等。在会议期间,由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国地质学会、中国

① Joseph Needham, "Report to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and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on the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Winter, 194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C60.

② Ibid.

③ "Joseph Needham to Mr. Peng and Miss. Liu," February 28, 1946,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C101.

④ 付邦红:《1946年中国一份发展科学的长期计划》,《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38—42页。

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致信首席代表胡适，请胡适在大会期间根据李约瑟第三份备忘录向大会提议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之下设立科学委员会。^① 李约瑟是中国自然科学社的荣誉成员，而他的好友竺可桢是气象学会的主席，好友李四光则主持中国地质学会，李约瑟与这四个科学社团均有密切关系。彼时的胡适正要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一份通讯中称，在伦敦举办这一次大会，讨论筹划创立一个国际教育与文化组织，但在短短的14天会期之内，这个国际组织的任务使命中增加了科学这一重要的领域，他相信这些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和有着科学追求的“科学人”（scientific man）的影响，将很快就能在国际教育中得到体现。^② 尽管胡适是从一个教育家视角出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本人其实并不认同李约瑟的左翼关切，但是，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期间“赛先生”的重要护旗手，胡适在会上同意把科学加入这个新成立的国际文教机构。可以说，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工作的讨论。在“UNECO”变为“UNESCO”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联合国民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发出自己的态度和声音，与国际社会形成强烈共振，可以视为中国参与战后国际组织的重大举措。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同样计划派出庞大的国家代表团，参加于巴黎索邦大学召开的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一届大会，其中包括朱家骅、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物理学家李书华、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程天放、外交官陈源，及顾问瞿世英、教育家萧瑜、外交官钱存典，还有两名秘书。^③ 中国代表团千里迢迢从中国出发，经印度一路前往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参加大会开幕式，教育部长朱家骅因故未能出席，而派遣赵元任为首席代表，朱家骅特意致电驻法大使钱泰，示意其代表国民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④ 这些足见国民政府

① “Document Sent to Dr. Hu Shih by 4 Chinese Scientific Societies to the UNESCO Conference in London through Delegates from China along Lines of Memo III,” November, 194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22.

② “Hu Shih Praises Accomplishments of UNECO,” December 11, 1945,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24.

③ 《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我代表团五人，朱家骅任首席代表》，《申报》1946年10月12日，第8版；《国府令派代表：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申报》1946年10月21日，第8版。

④ 《联合国文教会议下月十九日开幕：我代表团将取道印度赴巴黎》，《申报》1946年10月24日，第8版；《我参加联合国文教代表：今日来沪转印赴法，将准期出席巴黎会议，朱家骅团长可能改期十四日成行》，《申报》1946年11月3日，第8版；《联合国文教会议：法总统主持揭幕，我驻法钱大使出席参加》，《申报》1946年11月21日，第8版。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的重视。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年一度的大会之外,国民政府还积极组织代表团参加各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小型会议,数量之多以至于参会的外交官和秘书行程常常会重叠。^①

中国文教人员积极响应政治界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事务的关切。第一届大会召开期间,有专门的庆祝活动“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运动月”。为此,国民政府早在1946年8月就已开始准备,由教育部组织筹划在国内征集教育和艺术类展品。^②9月13日,朱家骅在教育部召开筹备会议,决定运送艺术品和教育用具参加巴黎的展会,20多件出自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在内中国著名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以及各种各样展示不同学年的教具和图表入选。^③最后,中国选了37件中国现代艺术作品从中国运到巴黎,还选了一批当时正在伦敦和巴黎展出的艺术品,代表中国参加展演。其余活动还包括赵元任的法语专题报告《论象形制度下中国语言文之效率》,音乐家周小燕和钢琴家李显明的演出,以及中国制作的日食科教电影,本来还安排梅兰芳前往巴黎表演,但因费用巨大和其他困难而不得不作罢。^④关于参会效果,如《申报》所报道,此次参会彰显中国位列“四强”之气度。^⑤除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李约瑟在第一次大会期间专门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史之贡献;大会同期的国际科学合作展览专门展示中国科学发展现状及中英科学合作馆,而这将成为李约瑟就任自然科学部主任后在欠发达地区推广科学合作参考的模式。在第一届大会期间,中国首席代表赵元任应选大会主席,原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当选教育组组长,陈源当选执行委员之一,为期一年。^⑥这些无疑都极大增加了中国面孔在国际舞台上的参与度。郭有守与陈源的当选,尤其是陈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之间建立起了重要的沟通渠道,使之后国民政府可以及时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态并部署相关对策。

① 《国民政府下达参加国际组织会议文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现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855,第551713—No.551714页。

② 《教部派陈善安来沪:接洽选送所有应征之国画出品准备运法参加联合国文教展览》,《申报》1946年8月31日,第6版。

③ 《教部派员来沪照料:国画图表不日运法,参加联合国文教展览》,《申报》1946年9月15日,第6版。

④ 《联合国文教会我国节目,俟我代表团到达后布置》,《申报》1946年11月7日,第8版;《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我代表团抵巴黎,代表团团长赵元任由美赴法》,《申报》1946年11月11日,第8版。

⑤ 《联合国文教组织国际现代艺展揭幕,我国出口颇赞赏》,《申报》1946年11月20日,第8版。

⑥ 《联合国文教会议我代表当选执委》,《申报》1946年11月25日,第8版。

除了组织和派遣中国代表团赴各类场合参加国际会议，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关系还体现在法理层面。1945年11月成立大会所通过的宪章很快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国内刊物。^①之后，中文版宪章就递交国民政府立法院，而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46年6月25日在南京通过宪章，并由外交部长王世杰签署。^②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根据宪章规定，国民政府接受、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文书应递交到英国外交部存案，国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和驻英使馆几经沟通和安排终于在1946年9月13日正式递交批准文书。^③国民政府的签署使得中国在法理层面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但也给后面该机构中中国代表权问题埋下伏笔。

三、中国态度：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

面对西方主导的世界，近现代中国曾渴望加入其中，彷徨地探索思考中国在其中的位置，比如，梁启超在撰写《大同书》时便尝试以“天下大同”这样充满世界主义的理念来思考中国对外关系、未来世界图景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诸如梁启超、康有为、胡适，乃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皆对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持乐观态度，视国联为公平正义实现大同的国际组织。^⑤岂料巴黎和会，列强罔顾中国抗议，仍将德国占领的山东转交给日本。自此，中国知识分子对国联产生诸多幻灭情绪，民族主义取代世界主义主导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际组织、国际合作的心态，“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加重后，越来越多人走向民族国家的立场。^⑥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

①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约章（附约章及最后议定书英文本）》，《教育部文教丛刊》1946年第1期，以及《教育通讯》1947年复刊第12期；《我正审议据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教育通讯》1946年第6期。

②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约章（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立法院第四届第三零三次会议通过、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国民政府批准）》，《立法专刊》1947年第25期，第316—323页。

③ “U. N. E. S. C. O Chinese Ratificati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 94/1431,也参见《驻英大使馆电请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约章批准书发交该馆以便转送英外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5，第551715—551737页。

④ 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91—204、208页。

⑤ 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5—124页，第191页。

⑥ 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载王汎森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71—314页。

眼中依然认为世界主义是未来的理想,而民族主义才是当下现实,国际主义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是沟通两者的桥梁,是从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的路径,亦即通过更加切实的国际合作试图去弥合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张力。^① 这点从中国科学家群体参与李约瑟及国际科学界在抗战时期的通力合作,以及有关战后国际科学合作讨论可以看出。即便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背书之下,英、法、俄仍然不甚认可中国位列四强的主张,但是,与此前中国在国联几乎无任何话语权相比,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中国是创始成员国,更是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可见,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角色大大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地位。日本筑波大学华裔教授潘亮指出,国民政府如此高度重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正体现其试图重建文化大国形象。^② 由此可见,面对外部世界和国际社会,中国政府的官员尤其是知识分子经常徘徊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这种互相交织的心态依然在很大程度塑造着中国对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而这又与国民党在内战中对合法性建构的政治诉求实现了耦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召开完毕,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特地邀请出席大会的李书华和瞿世英召开记者会,向国内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经过及决议案,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诸如科技合作馆、科研中心和基本教育的项目。^③ 在大会期间,中国代科学家常常为本国文教事业重建和发展需要,而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调拨相关资源给中国,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设立研究所。李书华在报告中总结到,中国应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紧密联系,因为该机构之建立可以直接推动世界教育、科学和文化合作,从而间接地培育世界和平。^④ 有评论甚至直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和终极目标是通过文化和教育合作去除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世界大同。^⑤ 从中可见,在对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智识合作的态度上,中国

① C. L. Hsia, "A New Deal for All Nation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222, 1942, pp. 124-132.

② 潘亮「國際組織における「新興文化大国・中国」の浮沈—草創期のユネスコと中国の二つの政權」,『國際政治』2016年第3期,45—58頁。

③ 《李书华瞿菊农招待记者:报告文教会议经过,郭有守当选教育组长,陈源被推为文教会理事》,《申报》1947年2月7日,第8版。

④ 李书华:《联教组织及其第一届大会经过》,《现代知识(北平)》1947年第8期,第15—18。

⑤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机构举行第一次大会》,《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47年第1期,第61—62页。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知识分子层面存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并存交织的情绪。

这种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交织的情绪，也体现在中国对本国历史文化资源的认同感，以及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中华历史文化的愿望。为促进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设计中，成员国设立全国委员会，以此整合政府及国内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机构。^①早在1946年9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召集美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议，《申报》便有报道。^②几天后，《申报》再度援引杜鲁门讲话，指出中国在国际文教合作中责任艰巨，纵然在科学技术方面较为落后，但在精神文化方面先哲们留下文化遗产，虽间或有介绍到西方，但仍旧一鳞半爪，建议中国应该宣扬民族文化，使孔孟的思想学说也能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所以应该特别重视中国在国际文教合作中所处的地位。^③《申报》的评论建议中国也应该效仿美国，在准备参加国际文教合作时，在国内设立全国委员会，在教育部之外，或教育部之下，由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各著名大学，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方面类似博物院图书馆或科学社团，共同组织，共同商讨、处理协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合作。^④

《申报》还评论，“我国在此项工作中所处的地位，特别重要，人家有望于我们的也特别殷切。所以对于参加此项工作，我们特别应该有优良的表现，以增进世人对于我们的了解”。^⑤《申报》表述并没有夸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确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待。作为当时人口最大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合作空间。总干事赫胥黎在1947年就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系中国。郭有守建议赫胥黎可致信陈源，敦促中国成立全国委员会，如此可在基本教育远东地区研究会议召开之际宣布。^⑥1947年3月12日，赫胥黎致信朱家骅，援引宪章有关全国委员会条文，提及主要成

① Vincenzo Pavone, *From the Labyrinth of the World to the Paradise of the Heart: Science and Humanism in UNESCO's Approach to Globalization*, Lexington Books, 2008, pp. 107-108.

② 《杜鲁门总统畅谈：文教组织重要性》，《申报》1946年9月27日，第6版。

③ 《国际文教合作》，《申报》1946年10月2日，第2版。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Dr. Kuo Yushou to Julian Huxley,” March 1, 1947, UNESCO Archives, X07.217/51.

员国诸如美国、英国、法国、巴西等均已成立全国委员会以将宪章规定付诸实践,中国应该加快进程,如此可以借着即将在中国南京召开的远东地区基本教育研究会议之际,为参会诸国代表树立榜样。^① 作为回应,1947年4月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全国委员会筹委会,以研究设立该机构应具有何种组织架构,所提的建议均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所采纳。^② 筹委会包括诸政府官员及代表性知识分子,如张道藩、吴有训、吴贻芳、萨本栋、卢于道、蒋复璁等。^③ 同月12日,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全国委员会成员、数量,准入机制及责任。^④ 同年7月24日,朱家骅致信副总干事,向他报告,中国全国委员会筹备工作已妥善安置。^⑤ 到7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审核各类机构的候选人,宣布将于8月份召开成立大会。^⑥ 很快,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就公开发表,共有120名左右,教育界30名、科学界30名,文化界40名,并有政府代表20名,几乎囊括当时中国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和各个领域的重要代表。^⑦

1947年8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明志楼召开,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政府立法院、社会部代表及包括陈立夫、杭立武、程其保、胡适、梅贻琦、竺可桢等超过70位委员参加成立大会,朱家骅为大会主席,胡适和吴贻芳为副主席。^⑧ 大会讨论全国委员会章程,并认为委员会应以建立和维系中国国内教科文团体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沟通合作纽带为使命,为国民政府开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合作建言献策,并完成政府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委任的工作。^⑨ 在120名委员中,100名是由专业学术团体评选,而另外20名则有教育部遴选,任期三年,任期

① “Julian Huxley to Chu Chiahua,” March 12, 1947, UNESCO Archives, X07.217/51.

② Cheng Chi-pao, “Report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UNESCO,” June 20, 1948, UNESCO Archives, X07.217/51.

③ 《联教组织中国委员会即将成立》,《教育通讯(汉口)》1947年第12期,第30页。

④ 《协会: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协会汇报》1947年第1—2期,第8页。

⑤ “Chu Chia-hua to Mr. Walter Laves, Deputy Director-General UNESCO, Paris,” July 24, 1947, UNESCO Archives, X07.217/51.

⑥ 《文教组织中国委会下月下旬在京成立》,《申报》1947年7月30日,第5版。

⑦ 《联合国文教组织:中国委会已筹备,本月底在京开成立大会》以及《文教组织中国委会委员名单已发表》,《申报》1947年8月28日,第6版。

⑧ 《联合国文教组织中国委会:今开会宣告成立,明选举执委及正副主席》,《申报》1947年8月28日,第6版;《联教组织中国委会昨晨在考试院揭幕:到委员翁文灏胡适陈立夫等七十余人》,《申报》1947年8月29日,第6版。

⑨ 同上。

内每年召开年度会议；另设立执行委员会，由15名执行委员，其中，10名从全国委员会中选拔，另5名由教育部任命。除此之外，为对接工作，执委会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架构，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大众广播、图书馆与博物院、艺术与文学、哲学及人文科学6个专门的委员会以配合工作。^①成立大会持续三天，并于8月29日大会选出任10名执行委员，包括胡适、朱家骅、吴贻芳、竺可桢、杭立武、张道藩、萨本栋、朱经农、瞿菊农和梅贻琦，这10名执委与教育部任命另外5名委员共同成为中国委员会执行委员。^②在当天下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励志茶会接待了出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国委员会成员。^③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再度邀请胡适、梅贻琦、李书华、萨本栋、钱端升、熊庆来、蒋复璁、瞿菊农、吴贻芳和朱家骅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其官邸共进午餐，足见国民政府尤其是蒋介石对此事的重视。^④

中国所表现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交织的情绪，尤其体现在他们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天下大同、天下一家概念的援引。现代中国在面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际竞争之际，大同理念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重新构想，一个可以让中国获得真正和平环境和世界秩序的思想策略。^⑤1947年8月2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考试院长戴季陶在致辞中援引明志楼楹联“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人群进化，世界大同”，以及儒家的智勇仁三大德和六艺，并宣称“归纳孔子世界大同之旨，及国父三民主义主旨，与国际联教组织欲以教科文合作，谋求世界大同，诚不期而合”。^⑥会议的文化分场就有关如何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宣传推广中国文化，讨论结果认为，仅通过翻译和介绍中国古代作家和哲学家的重要作品，以及向

① 《联合国文教组织中国委会：今开会宣告成立，明选举执委及正副主席》，《申报》1947年8月28日，第6版；《联教组织中国委会昨晨在考试院揭幕：到委员翁文灏胡适陈立夫等七十余人》，《申报》1947年8月29日，第6版。

② 《联教组织中国委会闭幕：胡适等当选执委，蒋主席茶会招待全体委员》，《申报》1947年8月30日，第6版。

③ 《蒋主席于廿九日下午五时，在励志社茶会招待联教组织中国委会全体委员后，偕夫人走出礼堂》，《申报》1947年8月31日，第6版。

④ 《主席昨午欢宴：胡适梅贻琦等》，《申报》1947年8月31日，第6版。

⑤ 罗志田：《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216—241页。

⑥ 《联教组织中国委会昨晨在考试院揭幕：到委员翁文灏胡适陈立夫等七十余人》，《申报》1947年8月29日，第6版。

外国观众展示中国历史上优秀的艺术作品就可以传扬中国文化。^①新文化呼吁打倒孔家店,但在此次大会上,与会者甚至建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大会在中国召开,因为届时是孔子2500年诞辰,可以发动世界尊孔运动。^②胡适认为,政府可以任命中央研究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届时组织一次纪念活动,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或者北平举办大会。^③虽然“发动世界尊孔运动”在最终决议被删去,但是,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和孔子俨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互动的话语资源。中国教育家陈行可在《国民教师通讯》发文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合国怵于人类互相残杀的惨祸,一般爱好和平之士,产生文教组织,正想站在有教无类的立场,实现四海兄弟,世界大同的思想,正是我们三千年前伟大的哲人孔子,早已创立,他一生栖栖遑遑四方奔驰,都是想实行其道,即实现这崇高的理想”。^④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理想情况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以世界主义之名,帮助中国谋求教科文发展的必要援助,而中国的发展和对中国文化精华的推广反过来又可贡献于世界大同目标的实现。1947年11月,在墨西哥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届大会上,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致辞称,中国人一直以来都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因此,中国将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全力协助。^⑤李书华再度出席1947年11月墨西哥大会,并发表参会报告,声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终极使命是跨越种族、性别和宗教差异,通过世界各国之间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合作达到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所推崇的天下大同及国父孙中山所践行的“天下为公”理念一致。^⑥

但是,必须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国民政府援引“天下为公”的动机有所不同。对杭立武、戴季陶之类的国民政府官员而言,“天下为公”是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及旗下机构最佳话语资源。国民政府深度援引儒家“天下为公”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为统一党内意识形态,有意复苏新儒家思

①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成立大会报告》,《教育部国际文教丛刊》1947年第3期,第7页。

② 同上。

③ 《联教组织中国委会昨晨在考试院揭幕:到委员翁文灏胡适陈立夫等七十余人》,《申报》1947年8月29日,第6版。

④ 陈行可:《孔子的思想与联合国文教组织的目的》,《国民教师通讯》1948年第9页。

⑤ 《联教组织全体大会:我国代表阐明目标》,《四川教育通讯》1947年第32期,第14页。

⑥ 李书华:《联教组织大会的经过及游墨西哥的感想》,《现代知识(北平)》1948年第7期,第5—7页。

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吸引越来越多中国人尤其是大学院校的青年，相比之下，在国民党当局执政下，“三民主义”却越发空洞而无法吸引和动员普罗大众。因此，国民党诉诸中国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理论资源恐怕是更多维护国民党统治权威的正当性。在此前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如《礼记》、《论语》和《孝经》等儒家思想及礼义廉耻的观念便已经被纳入国民党意识形态动员中。^① 文化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及国民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杂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中体现加淋漓尽致。在国民政府当局败退台湾地区后，1950年4月，《信使》刊发国民党高官程其保编译的《论语》选段，标题为“孔子这位中国千古圣人早已构想出大同世界”。^② 可见，台湾当局意在运用参与联合国旗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平台来呈现中国文化，垄断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代表权及国际认可，并连接国民党内新儒家色彩浓郁的意识形态宣传，从而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本教育会议在中国

联合国的政府间合作框架意味着它与成员国的关系必然要遭遇成员国国内的政治网络，而这又往往与国际政治网络交织。国民政府在组织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曾迫于美国斡旋的压力，不得不对国内其他政党表现民主精神。据王世杰日记记载，罗斯福曾密电蒋介石，中国其他党派成员，包括共产党员必须参与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③ 因此，国民政府组织了看上去有着多元化政党构成的国家代表团参加旧金山大会，其中包括共产党员董必武、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女性教育家吴贻芳、《大公报》编辑胡霖，还有来自“第三势力”的中国青年党的李璜和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勱。但是，这个代表团中半数代表是国民政府外交官，如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和施肇基等。^④ 可以说，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主导并垄断了联合国系统中的中国代表权。

① [日]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1—38页。

② Cheng Chi-pao. "Confucius the Most Sagely Ancient Teacher Planned a World Commonwealth," *UNESCO Courier*, Vol.3, No.3, April 1950, p. 12.

③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9450323，J4514052。

④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1979年第4卷第208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它与中国的关系也必然要受限于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虽然李约瑟的秘密报告也计划送给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李约瑟与左翼人士,尤其与周恩来关系很密切,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事务中几乎不见共产党人的身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有一百多位教育、科学和文艺界、宗教界人士,其中的国民政府官员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国民党主导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想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都只能通过国民政府的平台来对接;另一方面,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则赋予当时陷于统治危机的国民政府极大的合法性。而这便进一步增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政治化趋势。这种智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基本教育项目的合作。

当世界尤其是遭战祸最甚的欠发达地区面临着艰巨的战后重建任务之际,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专家、政治家和外交官纷纷看到,不仅需要重建文教事业,更需要全面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此方能赢得其作为联合国机构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便参与了盟国与社会安全和社会福利有关的国际规范和政策的讨论。^①比如,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官员便深度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善后救济总署的战后重建方案设计,企图借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和项目为战后中国重建设计新的发展模式。^②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也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到战后教育重建的国际讨论中。20世纪20—30年代,在五四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吁下,加上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授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等近现代中国知名的教育家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启各种教育实验、教育改革项目。这场乡村运动为解决中国乡村社会的贫、弱、愚、私等问题,城市平民识字扫盲教育逐渐发展为囊括识字教育、医疗卫生教育、生计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综合性乡村建设项目,其中尤以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模式为典

① Ma Tehyun, "A Chinese Beveridge Plan: The Discours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11, No.2, 2012, pp. 329-349; Ma Tehyun, "The Common of the Allied Powers: Soci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in Wartime China, 1940-1947,"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9, No.2, 2014, pp. 254-275.

② Rana Mitter, "State-Building after Disaster: Jiang Tingfu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World War II China, 1943-1949,"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61, No.1, 2019, pp. 176-206.

型代表。^① 在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下,乡村建设运动把乡村视为一个实验室,并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引进各种现代学科知识,诸如农学、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等以解决乡村社会问题。^② 他们不同程度地融合了本土和外来的思想资源,并试图以科学来指导实践,并致力于从实验中总结经验,提炼为可再度传播和运用的知识甚至理论。^③ 而这些正契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赫胥黎所秉持和推崇“科学人文主义”(Scientific Humanism)的精神。^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委会秘书处教育组成立专门的小组委员会把专家报告和论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46 年第一届大会讨论结果汇编出版。^⑤ 在该书中,晏阳初所推崇和践行的“民为邦本”的理念,在小组编辑委员郭有守的重新表述下,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本教育”项目的概念雏形。晏阳初对中国农民“贫、弱、愚、私”的诊断,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欠发达地区推动基本教育的重要口号。晏阳初的助手瞿世英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大会,并在大会上就有关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做出介绍,而原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后被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地区顾问,并主持编辑基本教育调研报告,在报告正式提出“基本教育”概念。基于中国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南京召开远东地区基本教育研究会议。^⑥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推进基本教育的背景与国内外政治局势有密切关系。例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与美国自由派精英关系密切,甚至得到美国大财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为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在战后的开展,晏阳初访问美国,接受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珍珠采访,赛珍珠关于晏阳初在中国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报道,加上晏阳初与美国自由派精英的紧密网络,使得晏

① 宋恩荣:《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② Charles W.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④ Julian Huxley, *UNESCO: Its Purpose and Its Philosophy*, Paris: Preparatory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46.

⑤ UNESCO, *Fundamental Education: Common Ground of All Peoples, Report of a Special Committee to 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aris: UNESCO Preparatory Commission. Education Section, 1947.

⑥ “Regional Study Conference on Fundamental Education, Nanking, China,” 1947, UNESCO Archives, EDUC/42, EDUC/47, EDUC/49, EDUC/50, EDUC/51, EDUC/58 EDUC/6.

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备受关注和赞誉。^①对当时必须竭力争取美国支援及国际认可的国民政府而言,晏阳初、平民教育加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教育合作无疑成为必须悉心经营的政治资本。

1947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远东区基本教育研究会议筹备委员会,瞿世英为秘书长。但在内战压力下,国民政府并无诚心及充沛经费来实施涵盖识字、卫生、生计和公民教育等内容的平民教育。在与晏阳初面谈中,纵然晏阳初强调农村和农民问题和军事同样是与共产党争夺的关键,但蒋介石依然拒绝资助晏阳初有关战后以教育促乡村建设的提案。^②因此,在这个节点上,与联合国机构举办大型国际研讨会变成一个形式上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为准备即将到来的南京会议,国民政府教育部派人前往江苏、浙江、南京等地考察,并下令江苏和浙江教育厅,南京和上海市教育局筛选指定学校以备参会代表参观,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会划拨六亿元经费给予支持和补助。^③到1947年6月,南京、上海、苏州、无锡和杭州等地的多所学校被指定为大会参观学校。1947年7月9日,瞿世英召开记者发布会,称筹委会以长朱家骅为主席,杭立武为副主席,并已经邀请包括朱经农、陈鹤琴、俞庆棠、郑晓沧和欧元怀等来自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的60多位中国专家,研究中国基本教育的成就与经验,并制定大会讨论议程。^④1947年7月10日,远东区基本教育研究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筹备大会。^⑤大会持续四天,有45名专家和筹委会委员参加,讨论分语言教学、教科书、教学方法技术、教育调查和教育行政等六个论坛,总干事赫胥黎对于南京会议的筹划和准备甚是满意。^⑥

1947年7月2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称,国民政府已经邀请包括菲律宾、印度、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在内的11个国家

① Yarong Chen, "Experimenting with a Global Panacea: UNESCO's Fundamental Education Programme in China, 1945-1950,"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Vol.68, No.3, 2022, pp. 345-368.

② 宋恩荣:《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第441—450页。

③ 《教部指定苏浙各校拨款六亿补助设施,准备招待远东基教外宾参观》,《申报》1947年6月23日,第5版。

④ 《瞿菊农招待记者:说明基教重要性》,《申报》1947年7月10日,第5版。

⑤ "Regional Study Conference on Fundamental Education in Mexico City, Report on Nanking Regional Study Conference on Fundamental Education," October 30, 1947, UNESCO Archives, FE. Conf./8; 也参见远东地区基本教育研究会议筹备委员会:《中国的基本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⑥ 《文教组织秘书长来电贺基教预备会成功》,《申报》1947年7月15日,第5版。

家参加南京会议。^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民政府协商拟定的受邀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和南太平洋周边的前殖民地，包括澳大利亚、锡兰、新西兰、砂拉越、缅甸、香港、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不丹、印度、尼泊尔、菲律宾和新加坡等。^②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郭有守、罗锐思（Joseph Lauwerys）和胡本德（Hugh W. Hubbard）作为代表出席。^③ 1947年9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地区基本教育研究会议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北极阁召开。^④ 蒋介石夫妇、国民政府高官及一众外国代表出席，朱家骅主持开幕式，蒋介石、张群等人致辞，教科文年组织代表及缅甸代表致辞，并朗读总干事赫胥黎祝词。^⑤ 蒋介石在致辞中，称“对于教育文化向来重视，对于基本教育尤为注意，有教无类，是中国的教育理想；化民成俗是中国的教育目的。中国以三民主义立国，本人相信三民主义之成功，必须实行全民的基本教育；世界大同之实现，亦有赖于各国人民之互相了解”^⑥。从蒋介石对晏阳初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种不同的话语，可以看出，南京会议更多是国民政府精心筹备的政治表演，蒋介石的官方致辞更是再一次把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连接起来。

国民政府精心组织的这场国际研讨会，持续多日。会议期间，按照国民政府所规划的行程，参会代表先后在南京市内参观多个幼稚园、国民学校、实验学校、中山陵等重要文化机构，并有鸡尾酒会、音乐会、书画展览等配套活动。^⑦ 9月12日，大会闭幕式在中央研究院举行，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励志社举办茶会，宴请所有参会代表。^⑧ 会议结束后，参会代表则前往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重庆、北京等地参观。^⑨ 由此可见，蒋介石虽无经费支持晏阳初，但为举办

① 《杭教次昨招待本市记者报告当前教育问题》，《申报》1947年7月1日第5版。

② 《远东区基教会议邀请十四国参加，墨西哥将派代表前来观光》，《申报》1947年8月21日，第6版。

③ 《郭有守昨招待首都记者阐述基教会重要性赫胥黎来函对我国文教贡献表示崇仰》，《申报》1947年9月3日，第6版。

④ 《基教会议昨上午报告三项决定下午开两小组会议》，《申报》1947年9月5日，第6版。

⑤ “Director-General's Message to the Regional Study Conference in Nanking on Fundamental Education, Paris,” August 22, 1947, UNESCO Archives, Educ. 49.

⑥ 《蒋介石祝词，基教会当场宣读》，《申报》1947年9月4日，第6版。

⑦ 《近百年画展决延期举行配合基教会外宾参观》，《申报》1948年8月2日，第6版；《远东基教会成立特别小组研讨中国示范区，各代表参观儿童福利站盛赞小先生制》，《申报》1947年9月6日，第6版；《远东基教会议全体代表昨谒祭国父陵寝，印代表主祭献花致敬，参观栖霞社教实验区深为赞许》，《申报》1947年9月8日第6版；《基教代表参观日程》，《申报》1947年9月9日，第6版。

⑧ 《基教会议闭幕》，《外交部周报》1947年第39期，第3页。

⑨ 《基教代表参观日程》，《申报》1947年9月9日，第6版。

南京会议,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除了借联合国机构的这个平台开展外交活动,建构和维系“四强”之一的国际形象外,蒋介石更迫切的目的是借与联合国机构合作,强化国民政府在中国统治合法性,垄断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并借国际研讨会向国际社会展示其治下的中国所达到的教育现代化和国际化程度,以获得国际认可。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关系政治化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政府要召集组织国家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越发困难。早在1947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墨西哥大会,国民政府就采取经济节省的方案,通过召集那些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外交官而不是从中国遴选再千里迢迢跨越太平洋参会。^①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越来越小,再也没有声势浩大的国家代表团。到1948年,在黎巴嫩首府贝鲁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大会时,国民政府仅派出几位,报纸杂志中只提及朱经农、瞿世英和陈源。^②国家代表团成员数量的锐减,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出在国民政府参与国际组织的外交部署已经力不从心。南京会议后,国民政府也越发捉襟见肘,基本教育示范项目的启动经费没有着落,甚至“行政院”所审批的经费竟然被国民政府官员挪作他用,从而使得该示范项目的领导者胡本德不得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国民政府的腐败,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后不得不缩小项目规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在璧山合作的基本教育示范项目也仅持续一年就终止了。^③

这种政治化尤其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疏离国民党当局所组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1948年9月,东北战局明显给南京和长江三角洲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国民政府和几大学术机构尤其是中央研究院各院所已经在讨

① 《杭立武等代表出席联教组织大会》,《教育通讯(汉口)》1948年第9期,第28—29页。

② 《朱经农等出席联教组织年会》,《教育通讯(汉口)》1948年第7期,第32页。

③ Hugh W. Hubbard, *Transcription of Hugh W. Hubbard's Tape-Recorded Reminiscences of a Lifetime of Service in China 1908-1952*, Bethesda, Md.: Poolside Publications, 1989, pp. 144-147; UNESCO, *The Healthy Village: An Experiment in Visual Education in West China*, Paris: UNESCO, 1951; Yarong Chen, *Experimenting with a Global Panacea: UNESCO's Fundamental Education Programme in China, 1945-1950*.

论和制定迁出计划，结果是大部分院所拒绝迁台，大部分建筑、设备和整个架构、大多数学者，包括八个研究所的领导和众多院士，都将纳入新中国科学院。其中，1945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伦敦成立大会的首席代表胡适，在几次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沟通中，以当时国民党当局缺少外汇以及自己不通法语为由，拒绝代表国民党当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年大会，至于此前提议在孔子2500年诞辰纪念之时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华举办大会，最终也不了了之。^①

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佛罗伦萨举办第五届大会。迁台后，台湾当局非常重视这次大会，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46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0个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合法性，而捷克政府很有可能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提议驱逐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代表权。^② 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向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致电，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现已完全没有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资格，必须将他们从该组织的各项机构和会议中驱逐出去”。^③ 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从美国那边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台北“外交部”，提醒台湾当局因为拖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两年以上恐无法参加此次大会，可见顾维钧对参会的关切。^④ 为筹备参加此次会议，台湾当局几乎动员了包括“教育部”“外交部”“行政院”以及诸多驻外代表在内的整个顶层官僚。^⑤ 1950年4月，“行政院”给“外交部”下达命令组织代表团参加此次大会，并且在整个反共和反苏的调子上强调此次大会赢得国际支持与同情的重要性，而台当局的立论根基正是国民政府在一开始就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⑥

① 《胡适致广州“外交部”电报》（1949年8月1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07—552408页。

② 《“外交部”照会驻希腊代表》（1950年5月1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71—552472页。

③ 《周恩来外长关于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教科文组织中的代表资格事致联合国电及其复电》（1950年5月12日），北京：中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13-00013-01，第004—011页。

④ 《顾维钧致“外交部”电报》（1950年5月1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83页。

⑤ 《“教育部”照会“外交部”文书》（1950年4月2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26—552427页。

⑥ 《“行政院”令“外交部”文件》（1950年4月2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28—552429页。

陈源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执行局委员几年之后,非常清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运作,以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谋求利益的空间,因此,他建议台湾当局“行政院”可以遴选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知识精英,让他们代表台湾当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以便在大会上为台湾当局谋求国际认可。^①至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变成台湾当局谋求国际承认和合法性的工具。随后,1950年5月,在陈源的提议下,“行政院”下达命令给“外交部”,组织人马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②胡适因为在欧美知识分子圈层中的声誉,并且有可能会被提名和当选执行局委员,所以他再一次成为蒋介石和台湾当局选派参加国际组织的候选人。^③鉴于胡适此前已经多次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的邀请,此次拒绝也在意料之中。^④台湾当局把目光瞄准另外一位多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为让李书华参会,台湾当局轮番几次劝说。^⑤“教育部部长”程天放、“外交部部长”叶公超甚至“行政院长”陈诚亲自下达命令。^⑥但是无论如何有说服力,甚至带了一些强迫,李书华依然以他忙于研究,并无资质也不合适为由拒绝参会。^⑦台湾当局不得不替换掉李书华,任命台当局驻希腊官员温源宁为首席代表,并致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⑧

① 《“教育部”照会“外交部”文书》(1950年5月1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57—552458页。

② 《“行政院”令“外交部”文件》(1950年5月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52—552455页。

③ 同上。

④ 《“驻外代表”段茂澜电台北“外交部”》(1950年5月1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52469页。

⑤ 《“驻外代表”温源宁电函台北“外交部”》(1950年4月2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36页,以及《段茂澜电函台北“外交部”》(1950年5月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48页。

⑥ 《“教育部”程天放致段茂澜》(1950年5月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56页,以及《段茂澜电台北“外交部”》(1950年5月1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63页。

⑦ 《李书华电台北“外交部”、“教育部”》(1950年4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35页,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程天放致段茂澜》(1950年5月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56页。

⑧ 《“台北驻希腊代表”温源宁提交文件》(1950年5月1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67—552468页;《台北“教育部”电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海梅·托雷斯·博德(Jaime Torres Bodet)》(1950年5月1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65—552466页;《程天放致段茂澜》(1950年5月1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76—552478页。

如李书华所感，参加国际组织大会事务，其智识属性越来越弱，而呈现出越来越浓的外交和政治属性。^① 在联合国体系中，中国代表权一直为台湾当局所持有，直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大陆的学者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编纂项目。该项目受到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启发，试图走出“欧洲中心主义”，重写全人类科学文化史。^② 李约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项目编委会推荐两岸学者参与此项目，大陆有哲学家冯友兰、社会学家费孝通、陶孟和以及历史学家郭沫若，台湾地区有胡适和翁文灏。^③ 尽管李约瑟认为该项目应该有新中国学者代表，但是美国国务院知道后通过英国外交官向赫胥黎以及编委会施加压力，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只认可“国民政府”代表中国人民，而且已设立全国委员会，任何中国人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都不能绕过全国委员会。^④ 尽管赫胥黎以及编委都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这种国际学术项目并无坏处，但是考虑到中国代表性问题而没有同意李约瑟的推荐，最后大陆学者无缘参与这个大型历史编纂项目，而胡适也仅是通讯顾问。^⑤ 同样，因为中国代表权问题，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闭在中国设立东亚科学合作馆。^⑥

结 语

在国际主义高峰期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科学国际主义者李约瑟

① 《李书华电台北“外交部”、“行政院”》（1950年5月1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编号11-INO-03858，第552460—552461页。

② Poul Duedahl, “Selling Mankind: UNESCO and the Invention of Global History, 1945-1976,”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22, No.1, 2011, pp. 101-133; “Joseph Needham Draft,” February 7, 1950,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168; “Joseph Needham’s Correspondance,” July-September, 1950,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169.

③ “Joseph Needham’s Correspondance”, October 14, 1950,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ibrary, Joseph Needham Papers, D170.

④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London,” May 5, 1956,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371-123792; “R. S. Swann to Mr. M. Gordon Knox, American Embassy,” May 7, 1956,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371-123792.

⑤ “From the U. N. Department to Chancery, British Embassy Washington,” May 8, 1956,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371-123792; “R. S. Faber, British Embassy to R. S. Swan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May 8, 1956,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371-123792.

⑥ Gordon Barrett,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Legitimacy: China and UNESCO, 1946-1953,”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53, No.5, 2019, pp. 1516-1542.

的科学国际主义行动的激发和触动之下,国民政府及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战后国际科学合作和国际组织的讨论,和李约瑟合力一起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科学的加入。中国热情地拥抱刚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组织参与各种相关会议、项目,并且有着诸多宏大的设想,成立全国委员会准备参与国际事务。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历史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现代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经常抱持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交织的心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建构“文化大国”,这与当时国民政府精心维护国际形象、国际社会中国代表性和国内合法性密不可分。因此,国民政府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语经常援引儒家经典尤其是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等儒家观念,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勾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历史关系避免不了政治化。即便蒋介石以集中兵力对抗共产党为由,无力支持晏阳初的战后重建计划,却专门拨出经费、布置人员机构,组织体面的国际会议,并以音乐美术盛会延请招待国际友人尤其是国际组织代表,精心表演教育现代性和构建国民政府治下作为“四强”之一的东亚大国的形象。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的历史关系存在智识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中国的教科文界人士确有机会推广中国文化、参与国际战后教科文重建与发展的讨论和项目中,并贡献了一定的中国文化、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另一方面,可以说,正因为国民政府积极参与战后联合国体系诸多机构,给予国民政府极大的国际认可和援助,从而强化其在国内的中国代表权以及在国内的统治合法性,继而造成台湾问题中很重要的面向即关于国际社会中国代表权问题,尤其是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即便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甚至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在联合国体系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附属的各类学会之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依然面临中国代表权问题。^①短短几年,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机构的外交部署和参与,有着复杂的历史遗产,深刻影响了冷战乃至更长时期联合国教

^① Feng John Hsien-hsia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1980s,"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5th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Brisbane, July 21-25, 2018.

科文组织与海峡两岸的教科文合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是联合国机构政治化的典型事例。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目标是通过推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来增进正义、法制、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建设世界和平和安全。如前文所述,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背后是基于功能主义的思想。功能主义强调共同现实需求,认为应该把关注的焦点从政治议题转为现实的问题和目的,因此,功能主义寄希望于绝对理性的、不掺杂政治的管理和治理。^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世关怀以及智识合作理想的确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政府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冲突源于人类的无知这个论断有其合理性,但是,传播教育、促进文化发展、增进科学知识并不是解决冲突的万能药,也并不必然导致和平。^② 这种基于现实需求的功能性合作并不必然有效地促成功能主义者所希望的世界共同体,反而使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几年后迅速滑入冷战东西阵营对立带来的政治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人类知识,或者服务于科学家、教育家或者艺术家,而是作为一个催化剂,为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便利,而这些自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手段,其最终目标是维持和培育和平,谋求人类福祉。^③ 但是,在人类智识和道德凝聚力的基础上构筑和平这个目标本身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就是一个值得推敲的命题。^④ 法国哲学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对效力(efficacy)的研究发现,目的和手段分别有着不同的机制,手段的效力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是一个技术问题,而目的最终指向的是道德秩序。^⑤ 尽管功能主义倾向于把政治家和技术员、专家进行二元区分^⑥,但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后不久,有评论指出,为了促进目标的达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教育援助必须考虑政治问题。^⑦

①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 9.

② Mary Evelyn Blagg, "UNESCO: Product of Contradictions," *The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32, No.2, 1951, pp. 79-85.

③ Byron Dexter, "Yardstick for UNESCO," *Foreign Affairs*, Vol.28, No.1, 1949, pp. 56-67.

④ Reinhold Niebuh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NESC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 No.1, 1950, pp. 3-11.

⑤ François Jullien, Trans. by Janet Lloyd, *A Treatise on Efficacy: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Think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 35.

⑥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 9.

⑦ Mary Evelyn Blagg, *UNESCO: Product of Contradiction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全球智识合作组织,其草创之初便不乏大国博弈。它虽然推动纯粹智识领域的国际合作,但它同时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国政府所授权,且有着自己的行政官僚机构和运作机制。^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处于一个像“轮中轮”(wheels within wheels)一样错综复杂的场域之中。^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人类和平的伟大构想和举措,就在这个场域中不断地讨论、争辩、谈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的官僚体系有着自己的组织运作逻辑,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外交官等等,他们通常基于各自的思维偏好、民族文化和国家利益,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些使命和目标不同的理解和阐释。^③ 李约瑟最初在构思国际科学合作时便没有把政治和智识截然分开,而是深度卷入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而国民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多出于政治考量。到后来台湾当局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争取知识分子代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推动全球智识合作为己任,但在特定国际政治气氛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可避免地政治化,最激烈时候其创始会员国美国和英国先后于1984年和1985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绝对不是联合国机构中唯一遭遇政治化问题的机构。^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历史关系在智识和政治互动下的演变,或许可以给反思国际组织功能主义设置在现实运作中面临的困境提供一个案例。

① Vincenzo Pavone, *From the Labyrinth of the World to the Paradise of the Heart: Science and Humanism in UNESCO's Approach to Globalization*, pp. 69-91.

② 有关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与场域的论述参见刘莲莲:《国际组织学:知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80—195、297—303页。

③ Michael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Rules for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Mark Imber, *The USA, ILO, UNESCO, and IAEA: Politicization and Withdrawal in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⑤ Gene M. Lyons, et al., "The 'Politicization' Issue in the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2, No.4, 1977, pp. 81-92.